

向上游難於登天？

——香港社會流動的分析與對策

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在制度上鼓勵或保障創新，從而給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

香港是否「下流」社會，即中產生活水平是否每下愈況甚至變為「基層」，見仁見智，但香港年輕人慨嘆「就業難」與「上位難」，卻是近年的普遍現象。最近，社會經常討論年輕人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即在社會經濟地位或職業階層上的垂直轉變。多位政經領袖亦承認社會流動是下屆特區政府的首要解決課題之一。

社會流動率高，表示社會在立足點較平等，注重個人成就及更能調動工作積極性，可推進整個社會進步。相反，社會流動不足會帶來負面影響：對社會貧富懸殊愈不滿、仇富、對社會有怨氣、社會不和諧及缺乏個人積極性。有經濟學家認為維持高的社會流動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香港「向下流」？

在「八十後」或「第四代」（1976至1990年出生）父母的年代（約六、七十年代），相信只要努力讀書、工作，實現「香港夢」或向上流的機會總是存在，即所謂「總有出頭天」。香港一向被稱為「機會社會」，崇尚自由市場與公平競爭。我們相信一個人只要肯努力及能幹就有公平機會，從基層擢升至中高層職位，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世代人們對向上流不僅充滿期待，還有一份自信。

但今天，基於種種原因，對不少「八十後」這份信心有所動搖。有人說香港「八十後」是一代夢醒者，尋找不到一條出路，「香港夢」逐漸式微。今天的香港是否仍是一個「機會社會」？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今年5月的研究發現，52%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並不足夠，另外有65%人認為流動機會比十四年前差了。相反，有一些學者與創業家相信雖然現今社會環境與三、四十年前不一樣，但年輕人擁有的機會仍多於上一、兩個世代。

香港屬於高年平均個人收入（25000美元），但高度貧富懸殊的社會（堅尼系數已達到5.3），官方數據更顯示低收入住戶數目增加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趨勢。根據香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James Vere在2006年的研究，香港就業人口十年來的收入流動變化減少，近五年來的情況更差。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根據1996至2006年的人口普查收集的家庭平均收入數據，雖然發現實質收入6000元以下的組群人數比例下跌，6000元以上的則上升，不過低收入人數比例下跌不夠快，顯示近年來社會流動性太過緩慢。以家庭收入分布比例變化來看，一些近期分析指出香港仍呈兩極化趨勢，社會公平性未有改善。相對來說，就算仍有一點向上流，也不等於社會公平性沒有問題。

從學術角度來看，收入變化只是衡量社會流動的其中一項指標，其他指標如社會地位及職位階層變化更為重要。再者，收入差距與社會流動屬於兩個不同的研究課題，本文只集中討論以職業階層改變為主的社會流動問題。

工作難找、薪酬多年不變、升級機會渺茫等問題都困擾着我們的年輕人。事實上，由於全球一體化、經濟結構轉型及M型社會的出現，很多國家近年也同樣面對流動停滯的問題，並涉及經濟、社會、教育與個人等因素，其中有些問題值得我們注視，以減少社會流動不足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與損害。

客觀數據分析真實狀況

一般學者與政策制訂者較關心的問題包括：

- 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否真的變得更少向上流動？社會流動停滯是隔代還是同代性質？
- 對社會流動的個人觀感是否與客觀證據吻合？為何不同？
- 哪一群體的社會流動問題最嚴重或遇上最多困難？

作者為澳門大學副校長（學術），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院長及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院長。另擔任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副會長。

- 社會的流動機會結構、開放程度（具體表現流動的機會率）及平等性如何？
- 有哪些因素或障礙（個人條件、家庭背景、人口因素、經濟發展、教育制度、勞動市場、政府制度等）影響現在社會流動？
- 有什麼政府政策與方法可以作出改善？

媒體的大多討論只屬主觀立場陳述，尚待實證研究驗證其水平與因由。根據香港科技大學學者吳曉剛在2008年發表的研究，將4000名受訪者按出生年份分為四個世代及將職位分為六個層次（由非技術工人至管理專業人員），以分析其職業階層流動的隔代及同代改變。相對「第四代」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十四歲時其父親的職位比較，整體向上流佔67%，停滯佔8%，及向下流佔24%。結果證實隔代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大多為向上流。相對「第四代」受訪者目前的職位與自己的第一份工，吳曉剛發現整體向上流佔28%，停滯佔50%，而向下流佔22%。在停滯方面，「第四代」佔四個年代的63%，而向上流（21%）及向下流（15%）均比其他世代為低。由此證明香港「第四代」呈現同代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嚴重停滯不升的趨勢，但向下流卻沒有明顯增加。

另外，「第四代」受訪者完成學士學位的比例有30%，比其他世代高（四個世代平均為16%）。至於就業率，「第四代」為32%，也比上兩個世代高（四個世代平均為35%）。

吳曉剛利用多元迴歸分析，以



▲本港年輕人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樂觀（彭博圖片）

了解個人教育程度、所屬世代（一至四）、性別、是否本地出生及十四歲時是否住在公屋等因素，如何影響個人能否進身管理或專業階層（即所謂「中產」）。結果發現，教育程度較高、上世代、男性、家境較富裕等因素與成為中產階層有顯著關聯，成為取得社會流動的渠道。

總括來說，吳曉剛的研究數據顯示香港「向下流」（包括同代及隔代）未有增加趨勢，但個人出身確實能影響其社會流動，證明向上流動機會並非真的人人平等。再者，雖然香港向上流動情況並不像部分人所說的那麼差，但並不等於流動機會結構與分配已全面開放。

年輕人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他們對發展前途的看法，會影響他們對社會的觀感與個人的處世態度，甚至對社會不滿的情緒與表達方式。客觀定量的社會流動數據與個人主觀感受可能有所出入，但後者一直被他人忽略。現在社會需要正視的，不只是收集數據調查向上流動是否比以往低，更要從主觀感受出發，了解市

民認為向上流動的機會有多少困難。

主觀感受不可被忽略

筆者曾參與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簡稱「專資會」）在2010年進行的意見調查，以了解「第四代」年輕人的社會流動狀況，比較不同世代對社會流動的主觀感受及影響社會流動的主觀因素。調查合共成功訪問了433位「第四代香港人」及374位「其他世代香港人」。

研究結果顯示，有約20%「第四代」受訪者認為自己在過去五年經歷向下社會流動（其中以工人階級向下流動比例更接近45%），有75%認為停滯沒有改變，而只有約5%覺得自己有向上流動（即獲得晉升）。整體上約95%的年輕人未能體驗向上流（見表一）。

另外，約有逾30%「第四代」年輕人認為自己現在所身處的職業階層比他們覺得自己應該身處的階層差（「現實比期望差」），共有65%認為現實與期望相符，而只有不到3%的「第四代」受訪者覺得現實比期望好（表二）。

總括來看，雖然「其他世代」受訪者比「第四代」受訪者對社會流動機會的看法較正面，各世代的大部分受訪者都感到第四代同代職業階層流動的停滯或倒退。這些主觀感覺結果與吳曉剛的客觀數據有異同，前者發現第四代流動停滯的比例比後者高出約25%，但向下流比例卻相若。這也反映受訪者的個人觀感未必與實際情況一樣。

當然影響社會流動的主觀因素有很多，在專資會的調查中，「第四代」受訪者認為自己未能向上流動的原因依次為「學歷低」(51.9%)、「香港經濟唔好」(38.9%)、「政府政策失誤」(33.3%)、「我唔夠努力」(33.3%)、「缺乏相關經驗」(26.5%)、「家庭背景唔好」(16.7%)、「上層職位唔多」(16%)、「運氣唔好」(14.2%)、「人事關係唔好」(13.6%)、「缺乏社會網絡」(13%)及「高層退休無期」(1.9%)等(圖一)。

約三分之二的「第四代」受訪者同意讀大學或持續進修可以提高自己的向上流動機會，約77%也同意

「個人努力及其他後天因素比家庭背景更重要」。「第四代」與「其他世代」受訪者對教育與家庭背景的看法頗一致。這個對家庭背景的主觀理解顯然與吳曉剛的迴歸分析結果有差異。

調查顯示，大多「第四代」較少歸咎於機會不足或不公，而只是認為自己學歷、努力或經驗不足。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是公平公正的地方、就業市場開放，並且香港社會充滿機遇。雖然大部分年輕人對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表樂觀，但仍然積極面對，願意持續進修以提高學歷。這與傳媒的一般報道只強調政府政策失誤與上位機會減少，明顯不同。

經濟增長低拖慢流動性

在周期性經濟因素方面，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經濟繁榮為人們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流動。相反地，當經濟成熟或增長放緩，競爭自然較大，以致上流機會減少或拖慢流動性。香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實質經濟增長率達

8.5%。在1986至1996年的高經濟增長期，年輕人的實質平均收入倍增。相對1997至2010年的放緩期(特別是1998至2003年)，其平均收入增長只有約3.6%，遠比十年前的低，其中還兩度出現過去三十多年未發生過的負增長。經濟持續放緩，自然會影響就業、收入及社會流動。

過去幾年香港受到環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可能是導致上述75%停滯及20%向下流的主因之一，而低技術工人更首當其衝。也有人認為「第四代」比較不幸，他們成長在相對富裕的八、九十年代，沒有經歷過貧窮的洗禮。偏偏踏入社會工作後，卻要面對2000年科網爆破、2003年「沙士」和2008年金融風暴。上一代尚可藉着九七移民潮造成的空缺上位，「第四代」的職業穩定性卻不及上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傾向減少。

因此，要根本改進現在的流動性，在客觀層面持續保持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經濟結構失衡缺乏動力，收入分布與機會平等都會出現問題。不幸地，香港大部分工廠與部分服務業

已北移，在過去十多年因政府產業政策的失誤令經濟結構日益狹隘單薄。如今除了金融、地產及少數服務業一枝獨秀，其他行業的向上流動機會似乎已減弱。政府應積極配合產業結構的變化，找尋新機遇與新產業推動經濟多元增長，為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有利因素，從而創造更多就業與發展機會，如與內地整合經濟，協助向內地輸出網絡人才。但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及社會流動往往建基於人力資本與教育效能之上，社會亦要不斷合力改革教育，為新的產業結構提供合適、高素質的生力軍。

流動機會的結構和勞動供應

社會流動機會趨於制度化，學歷成為個人能否晉身中產的關鍵。「第四代」持續進修以獲取大學學歷的機會雖比上世代為高，但較深層次的問題是：是否政府不斷增加大學資助學位課程的名額就可提升社會流動機會？流動機會結構或供應本身是否由勞動供應所決定？

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同意，在新的知識型經濟下正規教育與學歷對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流動有一定的幫助，學士學位是很多職位的入場券，較高學歷有助減少收入向下流動的機會。過去政府已一直增加入讀大專人數的比例，從1996年的18.5%上升至近年的40%，雖然近年受資助學士學額仍一直停留在逾14000個，名額沒有增加。多數人都同意政府必須增加撥款讓更多年輕人能進入本地大學就讀受資助學士學位，令大學教育更普及和平等。

不過，增加學士學額也等於增加

畢業後的競爭，當經濟增長放緩及大學畢業生愈來愈多時，向上流不一定比以前容易。換句話說，社會流動機會供應本身並非單方面由勞動素質或供應所決定。事實上，急速教育普遍化及經濟結構改變會導致某程度上大學教育「票面值」的貶值，甚至產生畢業後馬上找工作的困難。這也表示青年人要不斷延長正規教育以確保自己的競爭力。

另外，從客觀的人口統計分析，香港出現所謂「世代樽頸」或排擠的現象。這個現象主要源於八十年代生育率下降，因此「八十後」的人口低於「八十前」的人口，令「八十後」向上流的機會受眾多「八十前」所壓着，升職與加薪的機會不多，形成樽頸。

公平教育與均等機會

唐宋時代中國社會決定社會地位的公平機制就是科舉考試制度，當時社會具高開放性與流動性，這「機會均等」概念，遠勝西方的貴族家庭出身決定論。但社會平等不可能單靠教育制度來提升，而在社會不公平之下，也難企求教育公平。

從人力資本理論來看，教育可以帶來經濟收入回報及改善個人社會地位。教育仍是社會弱勢的最佳社會流動管道，教育公平或均等是較合理社會流動的起碼保證。但教育與社會流動或階層地位的關係是雙互影響的，教育一方面可以提升基層的流動，但也可以是原有階級(或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或複製的機制，甚至家庭背景的差異被轉化成學校考試成績的差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原

則，可能會起到維護和延續一種不公平的社會結構的作用。

在具體的情境中，教育會出現哪一方面的作用，則取決於其他的因素(如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我們要設法幫助低收入家庭階層克服其不利因素，而達到教育機會與過程平等(或公正)的理想。

在強調公平競爭時，要確保平等的起步點，盡量減少一些人在客觀環境下令他們一開始便處於劣勢。教育的平等，最起碼可以做到的，就是政府教育資源投入的均等。港府一些政策與制度的失誤造成不同階層的教育機會不一樣，例如政府對進修夜中學、副學士及自資學位課程的人不給予資助，似乎對有意進修者設置障礙。另外，雖然教育資源投入均等，但學校之間存在差異，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小學階段就開始接受質量差異很大的教育。因此，在社會資源充分時，政府應設法讓學生接受較均等的學習過程經歷，盡量把學校之間的素質差距縮小。當然即使投入及過程均等，由於個人特性有異，學生學習的成果仍具差異。

總括來說，雖然教育均等不一定能達致社會平等，但教育不均會加深社會的不均，因此我們還是要設法盡量地令教育均等。英國政府近年開設一個詳載各種青年實習工作機會的中央資料庫，援助那些無法負擔無薪實習工作的學生，好讓他們能與中產的同輩一樣享有實習機會。這都是特區政府可以參考應用的。

我們不能單靠政府而不靠自己努力解決問題。在個人的層面上，除正規教育學歷外，青年人幹什麼才可能

表一 「第四代」受訪者對社會流動的主觀感受與客觀數據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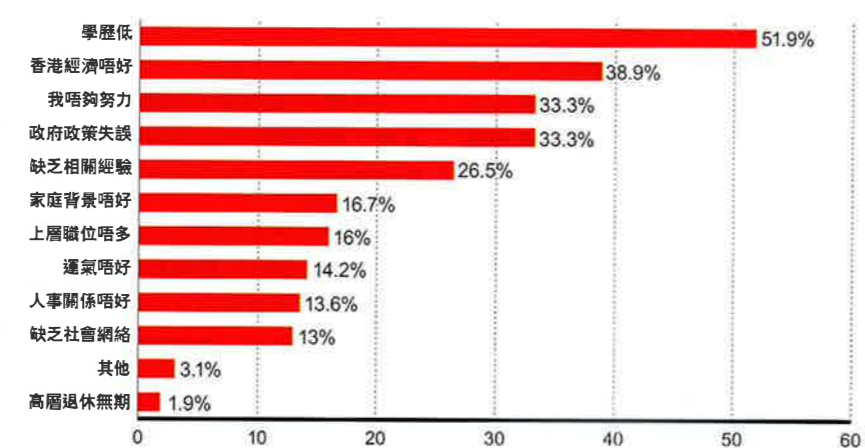
	整體百分比	服務階層	中產階層	工人階層
向上流動	5.6% (28%)*	8.7%	6.1%	0.0%
階級停留	74.0% (50%)*	91.3%	73.9%	55.8%
向下流動	20.4% (22%)*	0.0%	20.0%	44.2%

*括號內為吳曉剛的客觀數據

表二 「第四代」及其他世代受訪者對身處階層的觀感

身處階層	第四代受訪者	其他世代受訪者
比期望好	2.9%	1.9%
與期望相符	65.1%	77.2%
比期望差	32.0%	20.9%

圖一 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和對策



更有機會向上流？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在2011年初公布的一項青年人調查顯示，近70%受訪者認為香港新一代的競爭力遜於上一代，當中以年齡較大者為甚。該調查也指出，大部分被訪青年認為，他們的競爭力面對種種威脅，原因主要包括人才太多、自己不夠上進以及對自己缺乏信心等。

提升個人競爭力與橫向流動

決定「向上流」抑或「向下流」，自信心不可或缺，我們要思考和檢討為什麼現在年輕人對「向上流」欠缺信心。在全球化趨勢下，新一代青年不僅面對本地競爭對手，更面臨全球競爭對手（包括內地來港工作的尖子）。與上一世代相比，人才橫向流動亦在增加。在這方面基層的「八十後」確實是有點吃虧。

香港缺乏天然資源，經濟生存與全球化有密切關係，必須走外向型經濟。提高競爭力與自信不但要提高個人學歷及專業知識，更要針對外向型經濟重視培養個人的核心可轉移能力，包括中英語文、溝通、獨立思考、自學、解決問題、人際關係、團隊合作、領導、全球視野、國家認識、創意及道德責任感等。大學教育是必須但不是向上流動的唯一資本，還需解除文化屏障與增添社會資本。

香港大學教育制度一向問題多多，但現在大學都利用三改四的契機來改革本科課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要加強學生上述的能力。學校及青年組織應致力協助年輕人進一步自我裝備，把個人內在素質轉化為一己競爭優勢。這些改革也許可彌補來自基層的學生在這些方面的欠缺，有利改善

機會上的不平等。

北望神州及找尋創業機會

今天的社會環境都變得很不同，我們的教育應如何轉變去維持我們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值得港人深思。

由於香港經濟環境結構正改變及本地大學畢業生的競爭愈來愈大，年輕人應放眼外地，開發新的就業市場。但同意上述看法的青年人恐怕不多，不少「八十後」不願面對世界，寧願「留守」香港。

專資會的調查發現只有約37%的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全球化對香港利多於弊」及「中港融合對香港利多於弊」。只有不到一半的「第四代」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內地比香港有更多就業機會」，近83%「唔鍾意到內地工作」及「不打算長遠在內地工作」。四個主要原因依次為：家人朋友都在香港（60%）、內地生活素質欠佳（47%）、對內地存有恐懼（40%）及不熟悉內地文化（28%）。只有7%受訪者認同「到中國內地工作對提升社會階層有幫助」。

隨着內地與港澳的聯繫愈來愈密切，北望神州或北上就業是大趨勢。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環境與內地改革開放的機遇，香港年輕人需加強其國際視野和對內地的認識，並嘗試在外地作工作實習或生活的體驗，將自己的天空擴闊。這也可貫徹學以致用，人盡其才的目標。

再者，筆者認為青年人如發覺自己不是讀書或打工的材料，不如早一點自行創業，發展不一定會比一般受僱就業差。在後工業經濟也不乏創業機會，但其形式、途徑與風險性質

與舊工業時代有所不同。互聯網和電子商貿的興起，令很多行業的創業入場門檻也降低，有利中小企的生存，創業的機會反而多了。在加強網上創新能力上，Facebook就是一個典型創新的social networking，可幫助人到處流動，建立個人社會網絡與資本。很多簡單的東西通過social networking附加了經濟價值或效應。

政府政策的角色及限制

今天香港社會的經濟結構着實對年輕一代有點不公平。在促進社會向上流動，我們不可以單講追求「獅子山下精神」，政府有責任在各政策範疇上加強支援，包括改善教育、協助就業和增加培訓。但政府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有利於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在制度上鼓勵或保障創新，從而給年輕人一個得以靠自身努力來向上游的公平大環境。

政府有關公共政策可以紓緩現狀，但不能改變社會流動停滯的大趨勢。無論如何，在奉行自由經濟的社會，充滿挑戰也充滿機會，說六、七十年代的機會比現在多，仍很具爭議性。現在不少基層憑着努力及拼搏精神仍取得驕人成就，繼續造出一個又一個典型的成功故事。換句話說，機會是留給已準備好的人。

筆者認為只要「八十後」準備充足，為自己努力謀求機會，向上流之日仍應指日可待。相反，只抱怨社會不公，甚至遊行示威作發洩，而不努力向目標進發也是沒有用的。凡事怪罪政府或制度，或要求政府樣樣出手干預，並不可以解決問題，反而會令社會真的「向下流」。